

澆水、施肥、照顧，培育其長成大麻植株幼苗，以此方法栽種大麻，擬製造可供施用之第二級毒品大麻。

被告對上述犯罪事實均自白犯行，並有扣案大麻植株幼苗 1 株可證，第一審法院認定被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2 條第 2 項之意圖製造毒品而栽種大麻罪。該罪法定刑為「5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原審以「被告栽種大麻數量僅 1 株，且栽種期間非長，尚在幼苗階段即遭查獲，而種植之目的初僅為供己施用，則被告之惡性顯與大規模栽種製毒對外販售以求牟利之行為有別，對社會治安及國民健康之危害相對較小，其犯罪情節輕微，再參諸被告自警詢時即坦承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之犯行，犯後顯具悔意」等理由，認被告即使判處最低度刑之有期徒刑 5 年猶嫌過重，其犯罪情狀有顯可憫恕之情形，依刑法第 59 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判處被告有期徒刑 2 年 6 月，亦即量處法定最低刑。

1 株尚未成長的大麻，供己施用動機的製造：有期徒刑 2 年 6 月。

被告於警詢、偵查及審理中均自白犯行，而且警詢期間尚供出大麻種子的來源為購自「楊飛鵬」，也經原審認定有此人，被告卻不能依據系爭條文即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 條第 1 項：「犯第 4 條至第 8 條、第 10 條或第 11 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

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及第 2 項：「犯第 4 條至第 8 條之罪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分別遞減其刑。

即使動用了黃昭元大法官形容的神獸「烈空座」即刑法第 59 條，被告仍然不敵最輕 5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罪的重刑神獸「阿爾宙斯」。

二、疑義之性質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原因案件論罪的法條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2 條第 2 項：「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者，處 5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本條法定刑為 5 年以上有期徒刑，相較於同條例第 4 條第 2 項的製造第二級毒品（大麻）罪的法定刑（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為輕，因其為預備犯之性質。而以最高法院為首的實務見解，向來認為即使行為人是為了供自己施用的目的，同樣構成本罪（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為了自己施用的目的而製造或運輸毒品均屬之）。

實則以如此嚴苛的法定刑，立法者制定之初，是否有意將為自己施用目的而製造的類型一併納入本條項處罰，並非無疑。

蓋製造海洛因或甲基安非他命的技術、成本門檻，及花費的時間精力均高，較難想像有為自己施用目的的製造行為，此類製造通常是營利意圖，並非為己施用，可想而知。但製造大麻的成本及技術顯然

較低，將成長的大麻株，摘下葉子加以風乾及加工（例如捲煙）即得施用，因而實務上查獲僅有一、兩株大麻種植的案例比比皆是，本件原因案件即僅有 1 株植株。即使是如檢察官起訴所稱，被告日後要回賣給提供種子的來源者楊飛鵬，犯罪情節亦顯然輕微，且被告也供出來源者。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69 號解釋理由：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憲法第 8 條定有明文。鑑於限制人身自由之刑罰，嚴重限制人民之基本權利，係屬不得已之最後手段。立法機關如為保護合乎憲法價值之特定重要法益，並認施以刑罰有助於目的之達成，又別無其他相同有效達成目的而侵害較小之手段可資運用，雖得以刑罰規範限制人民身體之自由，惟刑罰對人身自由之限制與其所欲維護之法益，仍須合乎比例之關係，尤其法定刑度之高低應與行為所生之危害、行為人責任之輕重相符，始符合罪刑相當原則，而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無違。

正如大法官在釋字第 669 號解釋審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6 條製造(運輸、販賣)空氣槍的案例中，認為立法者施以刑罰手段具有必要性，但是：「所禁止製造、運輸、販賣之客體相對廣泛，一部分殺傷力較低之空氣槍，亦在處罰範圍內。基於預防犯罪之考量，立法機關雖得以特別刑法設置較高之法定刑，但其對構成要件該當者，不

論行為人犯罪情節之輕重，均以無期徒刑或 5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度自由刑相繩，未能具體考量行為人違法行為之惡害程度，對違法情節輕微、顯可憫恕之個案，可能構成顯然過苛之處罰，而無從兼顧實質正義。按不具殺傷力且無危害安全之虞之空氣槍係合法而容易取得之休閒娛樂商品，而改造此類空氣槍，所需零件易於取得，亦無須高度之技術。倘人民僅出於休閒、娛樂等動機而改造合法之空氣槍，雖已達殺傷力標準，但若其殺傷力甚微，對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等法益之危險甚低，或有其他犯罪情節輕微情況，法院縱適用刑法第 59 條規定酌減其刑，最低刑度仍達 2 年 6 月以上之有期徒刑，無從具體考量行為人所應負責任之輕微，而為易科罰金或緩刑之宣告，尚嫌情輕法重，致罪責與處罰不相對應。系爭規定對犯該罪而情節輕微者，未併為得減輕其刑或另為適當刑度之規定，對人民受憲法第 8 條保障人身自由權所為之限制，有違憲法第 23 條之比例原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 條第 1、2 項正是立法者關於毒品犯罪，除刑法第 59 條以外的「併為得減輕其刑之規定」，調和過於嚴苛且不區分犯罪情節輕重一律科以重刑的立法現狀，稍以緩解大法官上述所指摘違反比例原則的違憲立法，但立法者卻獨漏第 12 條之犯罪，致犯本罪者，無從因為供出來源或自白犯行，而有得為易科罰金或緩刑宣告之機會。

此外，以製造毒品大麻犯行而言，相較其他更為嚴重的既遂、未遂犯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第6項)，得因供出來源或自白犯行，而有得減刑為有期徒刑3年6月甚或1年9月以下，如再適用刑法第59條，更得減為10月有期徒刑，獲得緩刑宣告之機會。但僅屬預備犯性質的第12條第2項之罪，卻只能依刑法第59條減為有期徒刑2年6月，對首次犯罪且有悔意不致再犯，甚至協助司法或警察機關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卻毫無宣告緩刑之機會，明顯也違反憲法第7條的平等原則。

參、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一、從立法理由出發

民國98年5月20日修正公布(公布後6個月施行)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以下稱系爭條文)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第一項)。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第二項)」。

依行政院當時提案的第1項立法理由謂：「依學者研究及實務運作顯示，過度重刑化之嚴刑峻法刑事政策並不足以遏阻犯罪，抗制犯罪最有效之方法乃在有效之追訴犯罪及儘速判決確定。基於有效破獲上游之製造、販賣、運輸毒品組織，鼓勵毒販供出毒品來源之上手，

有效推展斷絕供給之緝毒工作，對查獲之毒販，願意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採行寬厚之刑事政策，爰修正現行條文，擴大適用範圍並規定得免除其刑，列為第一項」；第 2 項立法理由為：「為使製造、販賣或運輸毒品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並鼓勵被告自白認罪，以開啟其自新之路，爰對製造、販賣、運輸毒品者，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時，亦採行寬厚之刑事政策，爰增訂第二項規定」。

二、違反體系正義侵害平等原則

如比較不同犯罪類型，違反本條例第 4 條第 2 項(第 1 項亦同)製造第二級毒品，可以因為供出毒品來源，依據系爭條文第 1 項規定減免其刑；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者，卻不能因為供出大麻種子來源而減免其刑。製造第二級毒品者，可以因為偵、審自白，依據系爭條文第 2 項規定減輕其刑；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者，卻不能因為供出大麻種子來源而減免其刑。簡言之，已生法益實害的既遂犯可以適用減免其刑的規定，僅生法益危險尚無實害的預備犯，反而被排除在系爭條文之外。其間的差別待遇，看不出正當理由何在？

平等原則為所有基本權的基礎；國家對人民行使公權力時，無論其為立法、行政或司法作用，均應平等對待，不得有不合理的差別待

遇¹。平等原則要求的為實質平等，大法官在歷來的解釋中不斷闡釋其中意旨謂：平等原則並非保障絕對的、機械的形式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參見釋字第 211 號、第 341 號、第 412 號）；釋字第 485 號解釋更是開宗明義即宣示：「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區別對待」。

至於應如何判斷此差別待遇是否「合理」，大法官亦不諱言，此乃違憲審查之難題所在²。正如前述，檢驗法律是否符合平等原則，判斷重點即在差別對待是否「合理」，換言之，是否具有正當性而為憲法所容許的差別對待，亦即「實質正義的不平等」³。即俗稱「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具體之判斷方式，翁岳生前首席大法官說得清楚：關於平等原則之違反，恆以「一方地位較他方為有利」之「結果」存在為前提。不論立法者使一方受益係有意「積極排除他方受益」，或僅單純「未予規範」，祇要在規範上出現差別待遇的結果，而無合理之理由予以支持時，即構成憲法平等原則之違反。因平等原則

¹ 我憲法第 5 條規定：「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第 7 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明文揭示保障人民之平等權。又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規定國家應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而憲法基本國策章中第 153 條、第 155 條與第 156 條，亦對保障婦女與其他弱勢族群之實質平等設有規定，足見憲法上對於對平等原則之重視。

² 翁岳生大法官於釋字第 455 號解釋提出之協同意見書中明言。

³ 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2003 年 4 月，頁 182。

之旨趣在於禁止國家權力在無正當理由的情況下，對於相同類別之規範對象作不同之處理，故平等原則之本質，原就具有雙面性與相對性 (ambivalent und relativ)，嚴格而言並非各該「規範本身之違憲」，而是作為差別對待之兩組規範間的「關係」，或可稱為「規範關係之違憲」 (verfassungswidrige Normenrelation)⁴。

學者黃昭元於任職大法官之前也曾為文指出，平等與否應該是一種「比較性」或「相對性」的概念或結果，必然涉及國家與兩組（群）人民關係間的相互比較，而不像自由權通常祇是國家與個別人民間的關係。亦即「兩組關係的比較思考」與「一組關係的對立思考」。進而不諱言的指出，在方法論上，大法官所宣示「實質平等」式的定義方式，對於釐清平等權的意義、內涵或具體案例的討論，似乎沒有大用⁵。所以，如果真要對平等權下一個操作性定義，恐怕還是要採取「同者等之，不同者不等之」的基礎公式，然後在「差別待遇」、「分類標準」及「規範目的」（或「政府利益」）的分析架構上思考，並且以「類型化」的操作方式，才能發展出更細膩的審查標準⁶。

⁴ 參見翁岳生大法官於釋字第 455 號解釋提出之協同意見書。另參見李建良，論法規之司法審查與違憲宣告－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之分析，收錄於氏著，憲法理論與實踐（一），1999 年 7 月，頁 433(461)。

⁵ 黃昭元，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的合憲性－司法院釋字第 485 號解釋評析，臺灣本土法學雜誌，6 期，2000 年 1 月，頁 25。

⁶ 黃昭元進一步說明此基礎公式較有較高的可操作性理由：從是否為「同者」可引出對「分類標準」與「正當理由」的討論，而是否「等之」則引出是否存在有任何「差別待遇」的分析。參見前註。聲請人以為，此種思維顯然係採取美國法

最後，如立法者違反本身所建立之「體系正義」(Systemgerechtigkeit)時，亦足為判斷為對於平等原則之違反，所謂體系正義者，按立法者於制定法律時，在不違反憲法之前提下，固有廣大的形成自由，然當其創設一具有體系規範意義之法律原則時，除基於重大之公益考量以外，即應受其原則之拘束，以維持法律體系之一貫性，是為體系正義。而體系正義之要求，應同為立法與行政所遵守，否則即違反平等原則。

系爭條文第1項將違犯本條例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等實害犯之罪，甚至其中關於未遂犯的危險犯，與第12條之預備犯區隔成兩組規範關係，即使施用毒品犯罪者(第10條)都能因為供出毒品來源而減免其刑，但犯第12條第2項之罪者(第1項亦同)，供出大麻或大麻種子來源，同樣可以「有效破獲上游毒品組織、斷絕供給」，如同原因案件被告自白來源者「楊飛鵬」表示願意收購被告栽種成功的大麻株，卻不能因而減免其刑。就系爭條文第2項，立法者再次將犯本條例第4至8條者，與犯第12條第2項者區分，前者，包括第4條第6項的未遂犯、第5條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的預備犯在內，均得因自白認罪以啟自新，獲寬減其刑之利益，以販賣第二級毒

上所謂「平等權之雙重審查標準」，以「分類標準」及「差別待遇」（涉及優惠性差別待遇之案例則另考慮「規範目的」標準）兩層次為審查標準。關於美國實務及學說之介紹，請參見法治斌，司法審查中之平等權：建構雙重基準之研究，收錄於：法治國家與表意自由，憲法專論（三），2003年5月，頁211以下。

品罪的未遂犯為例，依未遂減輕 1 次，再依系爭條文第 2 項減輕 1 次，最輕得減至有期徒刑 1 年 9 月，不必動用刑法第 59 條，已達得宣告緩刑之法定門檻。相較之下，犯第 12 條第 2 項自白犯行之被告，卻無從適用第 17 條第 2 項減輕其刑，即使適用刑法第 59 條減輕其刑，最輕也必須宣告有期徒刑 2 年 6 月，對於犯罪情節輕微(例如只是為自己施用的製造栽種且數量甚少者)，或確無再犯之虞者，仍不能宣告緩刑。

原因案件的被告受到不合理的差別待遇，立法者卻沒有說明區分兩者，不將犯本條例第 12 條之罪者規範在內，使被告同受減免其刑之利益，其正當理由何在？導致所建立的立法體系產生不正義之情，這種無正當理由而為不合理的差別待遇，就是明顯侵犯被告基於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享有的平等權。

三、違反比例原則，不符適合性原則

以同一被告自己相比，更發現不僅違反平等原則，還違反比例原則。

被告如有意製造毒品而栽種大麻，自己先就國外網站引進大麻麻進而栽種，就運輸大麻部分的前階段行為，會構成運輸第二級毒品罪(第 4 條第 2 項)，與後階段的意圖製造而栽種罪，不論是以想像競合或吸收犯概念，從一重論以運輸第二級毒品罪(至於如運輸大麻種子

則構成私運管制物品罪及本條例第 13 條第 2 項之罪)。如果其後栽種大麻株成功，進而製造出大麻不論供施用或販賣，也僅會成立製造第二級毒品或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前階段的意圖製造而栽種罪同樣被吸收。

製造、販賣或運輸第二級毒品的法定最輕本刑為 7 年有期徒刑，因為適用同條例第 17 條第 2 項減刑，最多得減為 3 年 6 月，如再適用刑法第 59 條得減至有期徒刑 2 年以下，並得宣告緩刑⁷。但是尚未達製造行為，或非自己運輸大麻入境者，犯行相較顯然為輕，卻不能因為自白而減刑，最輕仍須處以有期徒刑 5 年，適用刑法第 59 條減刑，最輕有期徒刑 2 年 6 月，仍不得宣告緩刑。又非自己運輸大麻入境，而是自他人處收受大麻種子栽種者(如原因案件之被告)，也不能因為供出毒品來源，適用第 17 條第 1 項免刑或減至 3 分之 2 有期徒刑(2 年 4 月)之可能。對於被告而言，犯輕罪還不如犯重罪，其輕重失衡不言可喻。

對於自由權侵害之案例，我國仿德國模式，發展出可謂詳盡的比例原則為審查標準，所以「平等審查是否有比例原則適用之餘地」，

⁷ 參見本院 107 年度上訴字第 2959 號判決，即就運輸大麻種子入台，進而意圖供己施用而栽種成功，並製造大麻葉，構成本條例第 4 條第 2 項製造第二級毒品罪之被告，同時適用同條例第 17 條第 2 項及刑法第 59 條，遞減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1 年 10 月，與其所犯私運大麻種子的管制物品罪，定應執行刑 2 年，併宣告附條件的緩刑 4 年。

換言之，比例原則可否適用於平等權案例的討論，即成為我國與德國共同之課題。

學者許宗力於擔任大法官之前，曾撰文分析大法官解釋，嘗試建構平等審查的模式，並融入比例原則之審查標準，試圖提出得一體適用於自由權及平等權之審查標準，其審查層次更為精細分明，聲請人認為足以作為本案審查之方法，有介紹之必要⁸：

（一）平等審查的第一步是先判斷系爭法規範究竟有無存在差別待遇的問題，差別待遇係指對於具有「可相提並論性(Vergleichbarkeit)」的人或社會生活事實在法規範上作不相同之處理，而「可相提並論性」，乃指法規範上受到不同處理的人或社會生活事實，共同具有一個他人或其他生活事實所未具有的特徵。例如法規範對於服志願役及義務役者作不同處理，兩者共同具有一個他人所無的服兵役特徵，所以兩者可以相提並論。

（二）第二步是確定差別待遇的目的，判斷其究係追求、實現「不平等者不平等之」的實質平等目的，或是無涉實質平等的政策目的。此處的審查在平等審查居於關鍵地位。

（三）追求實質平等目的的差別待遇（適用合目的性審查模式）

⁸ 以下僅簡略介紹結論，詳細論證務請參見許宗力，從大法官解釋看平等原則與違憲審查，法與國家權力（二），190至192頁。

1. 倘確定系爭差別待遇屬追求實質平等之目的，則審查該差別待遇是否涉及敏感的差別待遇之禁止項目。

2. 審查差別待遇與目的間是否有合理關聯，即「合目的性」審查。因具高度不確定性，依各參數分別決定採取從寬或從嚴審查基準；必要時得佐以「事物本質」與「體系正義」的觀察。體系違反時，應進一步審查是否基於重大公益之考量。

3. 經「合目的性」審查倘認定違憲，根據合憲解釋的要求，視系爭差別待遇有無可能尚追求其他目的，繼續為第二或第三重的平等審查。如該其他目的屬政策目的，適用下述比例原則的審查模型。

（四）追求無關實質平等的政策目的者（適用比例原則審查模型）

1. 仍然要先為目的合憲審查，審查所追求目的是否符合憲法第23條所定的四項要件之一。確定應從嚴審查時，須進一步判斷所追求公益目的是否重大或極重大。

2. 確定目的合憲後，進入比例原則的審查核心，依序審查差別待遇是否有助於政策目的之達成（適合原則），是否除此以外，別無他法的不得已手段（必要原則），其所追求公益的份量是否超越因差別待遇而遭犧牲的平等法益（狹義比例原則）。

3. 倘確定違憲，視有有無可能追求其他政策目的，再為第二或第三重的平等審查。

原因案件為刑事處罰，屬追求無關實質平等的政策目的，系爭條文的目的是合憲應無疑問，進入比例原則的審查模式。聲請人再以原因案件之被告供出大麻種子來源為楊飛鵬為例，業經原審認定於犯罪事實內，雖楊飛鵬嗣後因僅有被告單一指證罪嫌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但實務適用第 17 條第 1 項之「查獲」，並非以有無起訴為斷，只要能確認被告的供述屬實，經司法警察機關移送偵查檢察官亦屬之。被告卻因為不能適用第 17 條第 1 項減免其刑，原審法院因而不會依職權調查其供出來源是否屬實，尤有甚者，若被告知曉不能依該條項減刑，自無誘因供出其來源，反無助於立法理由所欲達成的「有效破獲上游之製造、販賣、運輸毒品組織」、「有效推展斷絕供給之緝毒工作」目的。從比例原則而言，系爭條文第 1 項的立法目的不可能達成，也就是連比例原則的適合性原則檢驗都難通過。

四、即使審查節省訴訟資源的附帶立法目的，系爭條文亦違憲

系爭條文第 2 項的立法目的主要在鼓勵被告自白，俾使販毒等案件早日確定，以開啟其自新之路，立法者所著重者，乃「鼓勵被告自白認罪，以開啟其自新之路」，至於為使此類「製造、販賣或運輸毒品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等語，亦即所謂節省司法資源，至多僅是附帶的目的，無論如何，刑事訴訟的主角為被告，執法者是否因被告自白而能早日終結訴訟的節省司法資源，不能是主要目的。

從而，如認為販賣毒品常須耗費證據調查時日，因而被告自白能有助節省司法資源，但意圖製造而栽種的證據通常明確，有查扣的大麻株為鐵證，無須被告之自白亦得認定有罪，所以系爭條文第 2 項有理由排除第 12 條之適用，但仍不能兼顧早日「開啟被告自新之路」的立法目的。且通常就製造或運輸毒品罪的證據情勢也同樣清楚，有扣案製造工具夾加工原料等為證，或運輸途中當場查獲者，因而不須被告自白仍得認定，卻何獨排除預備犯性質的本罪？

總之，即使認為系爭條文第 2 項的立法目的在節省訴訟資源，卻將第 12 條排除在外，仍違反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與第 23 條的比例原則。

五、系爭條文無合憲解釋之可能

合憲解釋原則係指法律之解釋，若有多種可能性，只要其中存在有一種合憲解釋結果之可能，即應以之為解釋之結論，避免選取其他可能導致違憲宣告之解釋方式，以免對法秩序產生不穩定之影響。

刑事法並不禁止有利被告的類推解釋，惟類推適用的前提必須是法律產生規範漏洞，且此規範缺漏是立法者無意的省略，司法者並非不能藉由體系及目的解釋類推以填補缺漏，也是一種符合憲法平等原則的規範解釋方法。

經查被告觸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2 條第 2 項之罪，以偵、審

中自白未類推適用同條例第 17 條減刑，有判決違背法律事由而提起第三審上訴之案例，比比皆是，非本件原因案件獨有（但主張原因案件另有同條第 1 項減免其刑之適用倒是少見）。惟最高法院向來均持文義解釋之態度，認立法者為「明示其一、排除其他」，既第 12 條不在第 17 條第 2 項之列，無類推適用之餘地，甚且明示此為「立法政策之決定」（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2438 號判決參見）⁹。

依聲請人所見，普通法院審判體系，尤其最高法院的文化，向來極度尊重立法者意思，雖不致達「原意主義」之態度，亦不遠矣。實則立法者於第 17 條亦確實採取列舉法條文字之立法，明顯要排除第 12 條，正如最高法院所言，此為立法政策之決定，致普通法院於個案毫無合憲解釋之空間，系爭條文已無合憲解釋之可能。

肆、結論

基於上述理由，聲請人形成違憲之確信，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 條之規定，立法者的立法形成自由已違反憲法第 7 條、第 23 條的平等原則及比例原則，而導致對觸犯本條的行為人，又符合系爭條文之減免其刑規定者，即使情節輕微，適用刑法第 59 條酌減其刑，仍有過度刑罰之情，致被告非入監服刑不可，侵害被告基於憲法第 8 條享有的受正當法律程序保障的人身自由權。爰請宣告本條例第 17 條

⁹ 經聲請人查詢所得至少有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808 號、第 2438 號，108 年度台上字第 121 號、第 1050 號等多起判決。並無持相反見解之最高法院判決。

未將同條例第 12 條納入規範，違憲且立即失效。

此 致

司 法 院

聲請人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盈文

法 官 郭豫珍

法 官 錢建榮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1 月 5 日

【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附件一】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 107 年度偵字第 6706 號、第 6738 號

起訴書，暨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108 年度訴字第 24 號判決

書(即原因案件之起訴書及第一審判決書)。

【附件二】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808 號、第 2438 號，108 年

度台上字第 121 號、第 1050 號等判決。

【附件三】本院 108 年度上訴字第 1861 號刑事裁定(即原因案件停止

審理裁定書)